

论事实婚姻合法化

李曼佳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世界各国法律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态度也在建国至今的近六十年间有较明显的改变。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有条件承认事实婚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婚姻法;事实婚姻;承认

[中图分类号] D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09)0S-0108-03

一、我国对事实婚姻的界定以及立法轨迹

(一)我国对事实婚姻的界定

国内婚姻法学界通说认为,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婚姻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1] 159}。

在学理上,事实婚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事实婚姻是指当事人未履行结婚的法定程序,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群众也公认其夫妻的婚姻^{[2] 142}。狭义的事实婚姻是指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的无配偶男女,未经婚姻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

(二)我国事实婚姻保护制度的立法轨迹

自建国以来,我国1950《婚姻法》年以及1980年《婚姻法》均未对事实婚姻进行明确的规定;对事实婚姻效力的规定主要出自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之中。学界一般认为,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之民事效力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3] 160-164}:

1. 第一阶段:自建国初期至1989年11月21日以前,即有条件承认阶段。

1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规定:“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

2. 第二阶段:1989年11月21日至1994年2月1日,即逐步不承认阶段。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其中序言指出:“……,基于这类‘婚姻’关系形成的原因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复杂,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维护安定团结,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的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是符合实际的。”《意见》第1条至第3条对如何逐步废止事实婚姻做

出了具体的规定。

3. 第三阶段:1994年2月1日至今,即完全不承认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明确指出:“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2001年12月27日起施行的《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对事实婚姻的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予以区别对待:“1994年2月1日之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1994年2月1日之后,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应补办结婚登记手续。若当事人补办了结婚登记,其婚姻关系转化为合法有效的婚姻,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不补办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二、有条件承认事实婚姻的立法背景

(一)有利于保障弱势一方的权益

1. 保障妇女的权益

笔者认为:事实婚姻合法化最终的受益者是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与儿童。

作为事实婚姻的当事人之一,妇女在其中付出的情感、金钱以及精力都是不可忽视的。在现实中,有大量处于事实婚姻中的妇女为了这段并不“合法”的婚姻,牺牲事业,放弃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生儿育女,在家庭中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从事实层面而言,对于这样的婚姻,牺牲如此之大的女性而言,不论是否经过结婚登记,她们实质上已经充当了妻子的角色,而结婚证书与其而言,仅仅是一纸“爱情宣言”,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是,目前我国法律不承认1994年2月1日之后的事实婚姻之法律效力,这也导致了这些妇女在婚姻中做出巨大的牺牲与让步,最后甚至无法获得经济补偿,更谈不上法定继承男方的遗产。因此,法律上的强硬导致的结果

是弱势群体利益的损害,这种强硬背后对于妇女权益的损伤是一种社会对其牺牲行为的不支持甚至漠视,其引领的社会导向是妇女不应当在事实婚姻中妥协或是牺牲,完全丧失了双方相互扶持、共同进退的婚姻本质。

2.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如果说,选择事实婚姻这种方式生活是男女双方对婚姻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那么孩子则是事实婚姻中最有可能受到利益侵害,也最无辜的“第三人”。

虽然法律赋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种规定意在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利益,但并不彻底。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权利的前提在于非婚生子女的权益要在其生父自觉履行义务时,才可得到保障。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生父推卸责任,无可奈何的母亲一人负担起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这严重的损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对其身体发育与心理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我国目前对事实婚姻的态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无疑有“雪上加霜”的效果。加之现实中,妇女难以通过民事途径获得经济补偿,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责任在事实上又加在妇女身上,这就必然导致妇女无法借助经济补偿给予未成年子女更好的抚养与教育,这种间接作用在未成年子女的“不利益”和婚姻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立法目标背道而驰,不能说不是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二)缓和严峻的社会现实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西方发达国家对事实婚姻的“承认主义”以及“相对承认主义”存在不同的立法背景。但是归根到底,法律的制定最终须以社会现状和社会需要为落脚点和出发点,正是因为各国在事实婚姻问题上有将其合法化的实际需要,才纷纷立法或通过判例承认其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借鉴他国承认或是相对承认事实婚姻的作法,也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根基,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对事实婚姻法律化有了更为激烈的呼声,颇值得反思。上文提及的因事实婚姻不被法律承认而导致的妇女、未成年子女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护就是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在事实婚姻方面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却远不止于此。

首先,社会中大量存在离婚后未办理复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的情况。目前社会对复婚登记手续没有达到足够的认识程度,有的夫妇存在“意气离婚”情况,之后迅速和好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样的夫妇符合了事实婚姻的条件,两方的婚姻生活也与离婚前无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出现离婚后双方又同居,一方死后,另一方无法继承其财产的现象,法律对事实婚姻的强硬态度对丧失继承权一方的法律保障就显得相当薄弱。

其次,老年人同居问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普遍,为了减少儿女对老年人婚姻的反对阻力,老年人往往采取了不办理结婚登记而只共同生活的作法。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不承认事实婚姻,经常发生两个老人共同生活

了十几年,彼此扶持,相互照料,但是却因没有办理婚姻登记而在老伴死后无法继承遗产,导致晚年生活出现困难的情况。

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社会上也普遍认可其夫妻关系,虽未经过登记,但历经数年,夫妻恩爱,子孙满堂,如果在法律上仍将其视为非法同居,其子女仍被视为非婚生子女,夫妻间仍然取得配偶身份,相互之间也无法继承遗产,未免也使社会现实与法律脱节甚巨^{[4]70}。

(三)对事实婚姻的相对承认有碍私权

结婚登记是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依法办理结婚登记,获准登记,婚姻即告成立的法律制度^{[5]93}。结婚登记是公权力对婚姻事实的确认,而非创设新的权利,这种行政行为本身就是公权力介入私权的行为,从实质上分析,其行为本身对当事人并没有权利上的赋予效力,而限制了公民的婚姻权。即便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法律也无法无视目前大量存在的事实婚姻以及因其产生的各种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目前,婚姻法仅以是否进行婚姻登记来确定婚姻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免有失偏颇,过分注重了登记制度本身这种手段,而忽视了事实婚姻当事人的私权甚至追求婚姻幸福的期待,从婚姻法的立法目的来分析,实有舍本逐末之嫌。

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婚姻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而非行政许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行政确认以法律的一般禁止为前提条件,而行政确认则不受此前提的限制。因此,行政法在事实婚姻这一问题上有以下之共识:在婚姻登记之前存在的男女共同生活的行为并不违法。事实亦是如此,我国法律并未规定禁止未婚同居,根据“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法理,同居的事实并无“违法”之实,又何来“非法”同居呢?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将“1994年2月1日之后,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事实婚姻行为,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的规定亦是违背基本法理原则,和行政法产生冲突的法律规范。

在人权呼声高涨的当今社会,承认事实婚姻固然是在婚姻法层面对婚姻当事人私权的保障,它也是对入权的维护。在当代,法律对个人尊严、个人利益以及要求、自由的保护应该更为广泛,对入权应当抱有更为崇敬的态度而给予尊重。因此,事实婚姻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应该被加以合理的保护。

(四)缓和涉外婚姻的不协调状况

从国际私法的层面分析,由于各国间对事实婚姻的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在事实婚姻的认定上也时常出现“跛脚婚姻”(limping marriage)的情况,即婚姻在一国认为合法有效但在另一国为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该规定没有区别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可以理解为既适用于实质要件又适用于形式要件。按照这样的规定,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承认事实婚姻的国家的公民在该国共同居住并以夫妻相称,他们的婚姻是

受保护的,但是我国居民之间的事实婚姻却是不受保护的。

在世界各国运用多种手段,广泛承认婚姻效力的趋势之下,我国将事实婚姻合法化的举措必然有利于从本质上缓和国际婚姻的不协调状况,避免国际层面中涉外婚姻效力的不确定性,也能够有效减少“跛脚婚姻”给当事人造成的利益伤害。

三、反思: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事实婚姻——广义的事实婚姻

目前,观之世界对事实婚姻的立法,其中持承认或相对承认的国家大多仅对狭义的事实婚姻加以承认,上文提及的外国相关立法亦是以符合婚姻实质要件为前提的。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有扩大事实婚姻界定之必要。将广义的事实婚姻,尤其是有配偶的男女未经婚姻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也纳入法律规范的事实婚姻之范畴以内。

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以“没有配偶的男女”作为界定事实婚姻当事人的前提,存在不合理性。

从数次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来分析,我国立法机关对事实婚姻的主体都做出了“没有配偶的男女”这一前提;换言之,司法解释持的是“狭义事实婚姻”的态度。但是对事实婚姻的这种立法限制本身就存在弊病。其最为突出的矛盾体现在与刑法的不契合现象上。

《刑法》第 258 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我国刑法之“重婚”的定义包括了法律婚与事实婚,对此,1994 年 12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批复》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于是,婚姻法与刑法在事实婚姻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两者甚至在逻辑上出现了悖谬。根据司法解释,有配偶者未经婚姻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情况不被认为是事实婚姻的情

况下,有配偶者因事实重婚而触犯的重婚罪在民法方面就丧失了基础。

重婚罪的构成必须以犯罪主体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为前提,所谓事实重婚首先应确定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中至少有一个是事实婚姻。按照各个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态度,有配偶者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不能被认定为事实婚姻;自然地,此人也无理由在刑法上被认定为重婚罪。换言之,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主体的“无配偶”限定,事实重婚不应被判为重婚罪。婚姻法对 1994 年 2 月 1 日之后的同居关系不加以保护,而刑法却要事实婚姻导致的重婚罪加以刑罚,在逻辑上就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

于此同时,在现实中,事实婚姻中的一方被认定为重婚罪,而弱势的另一方(通常是妇女以及未成年儿童)却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得到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这就以保护弱者利益为原则之一的婚姻法在这一立法成效上大打折扣。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对待事实婚姻的立法方面应与国际接轨,借鉴其经验,有条件的承认狭义事实婚姻之法律效力。同时,我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适当放宽限定,将有配偶的男女未经婚姻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也纳入婚姻法调整范围内。

[参 考 文 献]

- [1] 巫昌祯,夏吟兰,田岚.婚姻家庭法新论——比较研究与展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2] 胡平.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 [3] 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比较研究与展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4] 卓冬青,刘冰.婚姻家庭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 [5] 蒋月,何丽新.婚姻家庭与继承法[M].福州: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